



政治哲学史

总主编 张志伟
韩东晖
干春松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彭永捷 主编



中国政治 哲学史

第二卷

政治哲学史

总主编 张志伟

韩东晖

于春松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彭永捷 主编



中国政治 哲学史

第二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关于本书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令“独尊六经”，儒家仁义之道成为王朝立国的价值基石。王莽受禅与改制，儒家仁政理想与现实政治效能之间的张力得以检验。记录汉代讨论治国根本思想的《白虎通义》，明晰了关注性情、风俗、礼乐以复三代之治的教化政治学。道教经典《太平经》倡导基于自然政治价值而追求太平理想之治的自然政治哲学。隋末唐初，王通需要面对和思考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引发的华夏正统与王道道统问题。唐代韩愈提出了仁义道统说和中国论。北宋时期，王安石推明天道以革新人事，他的新学提供了一套用于变法的政治哲学。同时，司马光以礼治思想重构家国秩序。南宋时期的朱熹，勾绘了一个仁义流布的天理世界。而同一时期的浙东学派，则以经世之学引人注目。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是儒学为仁义之道开辟道路重构政治制度的代表。本卷所选取的政治哲学主题，是儒家占主导地位局面下中国政治哲学发展演变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体现了儒家政治哲学所面临和应对的种种具体处境，也展现了儒家政治哲学坚守仁义价值的内在品格和变通应世的理论活力。

政治哲学史

西方政治哲学史（三卷本）

第一卷 从古希腊到宗教改革 刘 玮 主编

第二卷 从霍布斯到黑格尔 韩东晖 主编

第三卷 20世纪政治哲学 周 濂 主编

中国政治哲学史（三卷本）

第一卷 梁 涛 主编

第二卷 彭永捷 主编

第三卷 千春松 主编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 张文喜 臧峰宇 著

第二卷作者简介

彭永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儒学与传统文化、中国政治哲学史、儒教研究。主要著作为《朱陆之辨——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纵横家》，合著有《中国道家》《中外儒学比较》《现代西方人学思潮的震荡》《君子国智慧——韩国哲学与21世纪》《玄境——道学与中国文化》《圣境——儒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智慧》《智慧的故事》等，主编有《人文奥运》《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国学的新视野和新诠释》《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中国儒教发展报告（2001—2010）》。

梁涛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国学学刊》执行主编，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儒学史、经学史、出土简帛等。著有《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儒家道统说新探》《“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等，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入选北京市中青年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北京市“四个一批”社科理论人才等。

秋风 本名姚中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儒生文丛”第二辑之一）、《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等，译有《哈耶克传》等，主持编译“奥地利学派译丛”等。

任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政治思想史》（季刊）学术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儒家传统。博士论文为《南宋儒家经制之学的兴起：论薛季宣和唐仲友的经世思想》，代表著作为《道统与治体：宪制会话的文明启示》，编著有

《儒家与宪政论集》。

王心竹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中国古代哲学、儒家与传统文化。主要代表作为《理学与佛学》、《宋代经学哲学研究：理学体贴卷》（合著）。

段海宝 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副编审，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哲学、宋明理学、政治哲学。博士论文为《司马光哲学思想新探》，合著有《中国古代的德治与法治》，代表论文有《司马光中和思想试论》。

杨汝清 苇杭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孝道与礼乐、书院文化、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著有《〈孝经〉与成功人生》，代表论文有《以孝治天下——儒家治国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可行性初探》《传统孝道与现代法治》。

曹婉丰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秦汉哲学、儒家政治哲学。博士论文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禅让与改制》，代表论文有《从经典诠释到秩序建构——以王莽依经改制为中心》。

岳 晗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中国政治哲学史、儒家传统文化。博士论文为《朱熹政治哲学研究》，著有《家国情怀：儒家与族谱》，代表论文有《文化自觉视野下的当代书院复兴》《全球化视域中的中华文化复兴》。

秦晓慧 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家哲学、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博士论文为《自然与太平——〈太平经〉自然政治哲学发微》，代表论文有《“欲而不贪”——论孔子节欲观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益》《生命的困苦与超越——论庄子的生命智慧》。

秦际明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学与儒学、蜀学研究、汉代政治哲学。博士论文为《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白虎通义〉研究》，代表论文有《作为经学研究方法的政治哲学与经世观念》《论汉代经学师法、家法与学官制度》。

刘璞宁 荷兰莱顿大学人文学院区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哲学、隋唐哲学。硕士论文为《重塑王道——王通政治哲学研究》，代表论文有《王通的政治道统论》。

目 录

前 言	彭永捷	1
第一章 董仲舒论天人之际的治道	秋 风	7
第一节 董仲舒之问题意识		8
第二节 元：更化的动力		12
第三节 天人之际		19
第四节 以民从君，以君从天		26
第五节 法天而治		35
第六节 德教		41
第七节 学校、选举与士大夫		45
第二章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王莽“受禅”与改制	曹婉丰	53
第一节 从尧舜禅让到王莽“受禅”		54
第二节 经典诠释与秩序建构		68
第三节 再辨德与位		81
第四节 得天下与治天下——政权合法性的建立与维系		91
第三章 《白虎通义》的教化哲学	秦际明	101
第一节 三统论		101
第二节 礼乐论		113
第三节 纲纪论		128
第四章 《太平经》的自然政治哲学	秦晓慧	138
第一节 自然政治哲学		141
第二节 自然政治哲学渊源		147
第三节 《太平经》的自然思想		154
第四节 太平之世的政治理想		158
第五节 “致太平”的施政原则		161
第六节 政治实践——黄巾起义		173

第五章	王通的正统论与道统论	刘璞宁	183
	第一节 王道正统论		184
	第二节 王道道统论		196
第六章	韩愈的仁义道统论和文化中国说	杨汝清	210
	第一节 唤醒儒家的古文运动		211
	第二节 世存经典辨华夷		237
第七章	王安石的新外王政治哲学	梁 涛	256
	第一节 北宋儒学的整体规划与引庄入儒——王安石 政治哲学的历史、思想背景		256
	第二节 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王安石的政治哲学 建构		261
	第三节 孔孟之道与孔荀之制——王安石政治哲学的 定位与评价		269
第八章	司马光的礼治政治哲学	段海宝	277
	第一节 国家治乱本于礼		279
	第二节 礼治秩序		288
第九章	朱熹的天理秩序	岳 晗	296
	第一节 天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297
	第二节 亲亲、尊尊——理想家庭秩序的设计		305
	第三节 格正君非的政治设计		314
第十章	南宋浙东学派的经世哲学	任 锋	334
	第一节 观察浙东学派的新视角		335
	第二节 浙东学派的法度论		338
	第三节 治人主体的政德养成问题		350
	第四节 浙东学派的历史观和浙东道论中的认识论 与本体论取向		361
第十一章	黄宗羲的分权政治哲学	王心竹	381
	第一节 以三代之治为理想目标的政治设计		381
	第二节 “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具体落实		394
	第三节 民主启蒙还是传统民本：围绕黄宗羲政治 思想的论争		412
索 引			418

前言

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二卷。这一卷承担的内容，从时间跨度上来说，涵盖了从汉代至明末清初的漫长岁月。在这个时间段里，中国语境里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古老的裂土而封的封建制已经解体，秦统一六国尝试以郡县制来建设中央集权的新型国家体制，却因片面重视发展硬实力和过度崇尚以暴力来维护和运行权力而成为短命王朝。汉代先以黄老治国，休养生息，直到汉武帝“独崇六经”，才确立了新型大一统王朝和立国宏轨。即便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和一些作为治国理论依据的儒家经典，协和一个广土众民的庞大国家依然绝非易事，历史的种种处境留给每一个王朝的政治问题都很复杂，新兴王朝或者面临重新选择主导意识形态问题，或者面临王朝最高领导人产生方式的合法性问题，或者面临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政治正统性问题，或者面临王朝内部如何改革调适的问题，或者甚至面临君主政制是否还有必要的问题。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史、思想史以及相关的政治制度史，绝非某些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西方学者眼里所谓的循环与停滞，而是种种具体生存处境下的认真思考和努力应对。如果缺乏对古代中国历史的认知，那么便难以了解中国先民曾面临的具体处境，从而也难以对古代中国人治国的思想和得失有清醒明白的认知。比如，在今人的印象中宋代似乎是积贫积弱的王朝。毫无疑问，宋朝的确不是一个统一了中国传统疆域全境的王朝，只不过拥有传统疆域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然而国力上强盛的汉唐在宋人的口中却是“百世无善治”，所得评价很低。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广大区域难逢敌手，宋王朝却持续抵抗了半个世纪之久，宋的襄阳、樊城军民仅依靠邻近的两座城池，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包围下勇敢抵抗达七年之久。宋人所达到的文明成就与抵抗外族所展现的不屈与韧劲，让所有回顾历史的人不得不到宋代最具代表性的儒学

形态——理学中去寻找观念上的原因。人们只有努力找出宋人那些对于美好生活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的思考与共识，才能理解宋人为什么如此深爱自己的文明成就和生活样式，才能理解宋人何为保护维系王朝国家而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同样，只有从史书上了解到明代以前在野蛮的草原民族长期屠杀和残害下，中国这方土地上生民十不存一，人口从一亿多骤降至不足千万，在这种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极端困境下，人们仍然未曾放弃他们对文明和野蛮的理解，未曾放弃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代又一代地传承自己的文化，再去阅读其时儒生的著作，才会理解古代中国人是在用生命书写文明，他们凭着韧劲去驯化野蛮民族，最终使马背上的征服者为中原文化所征服，也才会理解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未中断文明历史的国度，自然也才会明白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发展为什么突然衰落了这个问题完全问得多余。本书的作者们致力讲述古代人的政治世界，在他们看来，我们愈是了解古代人的精神世界，我们愈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国人的生活离我们虽然遥远，但他们关于人类应有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样式的种种理解，对我们今人依然充满启迪和鼓舞人心。

作为本卷的前言，在此有几个问题，分别向读者作些交代。

第一，关于政治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的区别。

虽然整套“政治哲学史”都面临着上述问题，但在此也尝试着就本卷承担的具体内容作些说明。我们以往读的那些政治思想史或政治学说史著作，以及某些名不符实的政治哲学史著作，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着重于全面、系统地阐述传主的政治思想或政治学说，将其中的主要政治观点和思想逻辑介绍清楚。而政治哲学史的出发点则是政治哲学，依据政治哲学关注的政治价值、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诸要素，集中阐述古人对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构成此种美好生活应有的秩序和达成理想之治的具体实现方式。政治哲学的视角和启发无疑来自政治哲学这一学科，对此不用讳言。政治哲学借鉴自西方学术，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来重新理解和整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相较于政治科学，政治哲学或许更接近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特质。诸子百家皆务于治，而中国人对“政治”一词的理解，简单说就是“政”达成于“治”。什么是“治”？一谈到“治”，自然就涉及作为评判政治好坏的政治价值、作为理想之治的政治秩序，以及从政治价值出发达成理想之治的政治制度。比如，儒家在政治哲学上从“仁”或“仁义”的价值出发，试图通过“选贤与能”、礼乐刑政的方式达成“大同”之治，道家、道教则以“自然”为政治价值，在神

权及其代表“大贤良师”的导引下达成“太平”之治。自从汉武帝时代确立了儒家在政治上的正统独尊地位，其后历代政治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是不断回溯和重新理解儒家的“仁义”之道以调整或解决王朝所面临的政治问题，直至明末的思想家认为君主制的躯壳再也容纳不下儒家的“仁义”内核，他们有的主张重新恢复“封建”以回归仁义，有的主张探索“虚君”、士人众议的新型政治制度以回归仁义。总之，政治哲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观察和理解古代人政治思想的视角和维度，让我们去见识一下古代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和致思方式。

第二，关于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分期问题。

以往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史的分期，要么按照通行的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学术史的分期办法，诸如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教、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哲学史当成中国哲学史或中国学术史的附庸，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按阶级形态来划分时段。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描述中国历史发展，这在学术上一直存在着争议，现在学术界通常都不再采用这种做法。笔者认为，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实际历程来看，中国政治哲学史大体上应当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典籍中所传述的唐虞三代。唐指唐尧，虞指虞舜，三代指的是“三代之英”，夏、商、周（西周）的杰出代表，也就是圣王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被后世作为历史“故事”取之法之的时代。第二个阶段是从礼崩乐坏到“独崇六经”。礼崩乐坏的时代，也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从“古之道术为一”到“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这个时代，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诸子并作、百家争鸣。“百家”，并非指学术派别划分的“家”，而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家”。《汉书·艺文志》具体罗列了189家之多。可见百家实有其数，并非虚指。“独崇六经”，后世称为“独尊儒术”。治国之道从秦用法家，经汉初用黄老之术，再到独尊儒术。汉代人重视“术”更甚于“道”，先秦的“道术”一词到了汉代人那里，说法就变成“术道”，术放在道的前面。这个阶段是从“道术为一”，经过“道术为天下裂”，再重新到“道术为一”。在政治实践的检验中，单纯讲求效率和硬实力的法家、清静无为的黄老先后被淘汰，儒学被定于一尊，但这时的儒学就像汉初的黄老一样，业已过了学术上对百家的兼采、融汇阶段，“霸王道杂之”。前两个阶段的内容在《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一卷中得到反映。第三个阶段是从“独尊儒术”到近代以前。这是在儒家处于独尊地

位以后，每个王朝不断根据自身的处境来应对自身政治问题的阶段。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段，有中原民族与统治草原的游牧民族不断上演的侵袭与反侵袭，数个成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有的主动汉化，有的则建立起种族统治；有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取天下甚至改朝换代的武装起义，像汉代的黄巾起义，就是有指导思想、有政治纲领、有严密组织、有实施计划和步骤来夺取天下的造反起义；有君主扩张君权与士大夫依据儒家道义限制君权和匡正君主的体制之争。这个时段由本卷政治哲学史来反映。第四个时段，则是从清末西欧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产生“天崩地解”的影响开始，也就是最先殖民侵略全世界的西欧国家及后来兴起的俄、美、日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中国人民内有愚昧、残暴的清王朝野蛮统治，外有西方强盗国家野蛮侵略，在这双重野蛮压迫下自强、求新、求变，重构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时代。这一时段的内容由《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三卷来反映。

第三，关于中国政治哲学史的选材问题。

本卷选取了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代表人物、历史事件和政治文献作为分析对象。在政治人物方面，选取了董仲舒、王通、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陈亮、叶适、黄宗羲等人。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提出“复古更化”“独尊儒术”的儒学家，不了解他的思想也就说不清汉代意识形态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内在理由。王通是隋末唐初的儒生，其门人弟子称其为“王孔子”，他的著作被称作“王氏六经”。王通是比韩愈等古文运动代表人物更早发起儒学复兴运动的先行者，很早就意识到儒学的危机，也很早就提出了要重新复兴儒家的仁义的思想。在民族杂糅、融合的时代，他也很早就从理论上来处理道统与正统这样的政治课题。王安石和司马光则是北宋变法问题上的对头，虽然他们的学术出发点都是儒学，依据的是同样的儒家经典，但王安石提供了一套支持变法的儒家学术，司马光则提供了一套批评变法的儒家学术，儒家学术的解释力和创造性在变法问题上得到淋漓尽致的演绎。朱熹是宋代理学中道学一系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集中展现了宋代儒者从世界观和价值观统一的角度重新理解儒家以仁为核心政治价值追求，把仁解释为主宰着气化流行生生不已，作为“生理”与“仁理”合称的“天理”，并从天理的角度重构中原民族应有的充满生生之仁的天理世界。他的学术思想重申了二程兄弟对遥远圣王时代的取法和对后世历代与现世政治的批判，“三代以上天理流行，三代以下人欲横肆”“千载无真儒，百世无善治”。为皇帝授课每日只讲“诚意正心”四字以“格君心之非”的理学，拥有已经迈向近世甚至现代门槛的学术气质，展现

了宋代士大夫从儒家经典出发构建理想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极致，这也成为后世许多学者将宋代视作中国古代历史文明水平顶峰的原因。陈亮、叶适则是宋代理学之外的儒学派别功利之学的代表人物，他们从功利的角度解释儒学的功能，以纠正宋儒中普遍存在的过于重视义理而轻视功利的片面性。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他深刻地反思了中国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度，认为君主制度已经从施行仁义、造福人民的器物变成妨害仁义、残害人民的桎梏，儒家仁义之道应当另寻新的下达之器，他提出了“公其非是于学校”“虚君”等许多设想。虽然在文化上、观念上、制度上野蛮落后的人主中原者打断了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但从黄宗羲“明夷待访”等候来者的思考中，仍然能看到儒家文化积极解决自身问题向近代化或现代化自发演变的内部可能性。

相较于以往的中国政治哲学史、中国政治学说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视人物而轻视重大事件和重要政治文献的倾向，本书希望在选材上尽量照顾得全面一些。这样选材的理由在于，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形成的政治辩论和重要政治文献记载的有关政治问题的集中讨论，反映了人们对政治本身的认知。相较于单个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这些事件或文献，对于生活在如今时代的人们了解古人的政治生活及其关于政治生活的理论思考，提供了聚焦式的直观观察。

关于政治事件方面，我们选取了王莽受禅与改制这一重大事件。以往有关王莽受禅与改制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历史研究方面，研究者们的兴趣往往在于讨论王莽受禅究竟是合理的禅让还是精心的篡夺，分析王莽建政失败的原因。本卷的研究者则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讨论围绕这一事件所涉及的时人之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观点，从禅让问题、德与位的问题、获得政权的合法性与维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完全按照儒家经典所描述的理想世界与现实政治条件之间关系诸方面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在政治文献方面，我们选取了汉代学者和官员讨论治国道术的文件汇编《白虎通义》和汉代流行且被黄巾起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道书《太平经》。在由汉代中央政府召开的以治国指导思想这一重大国是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上，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各呈己见，相互问难、辩论。研究者尝试从中整理出《白虎通义》这一政治文献所反映出的汉代人的政治意识、政治问题、政治语言和政治思维。《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以“自然”为基本政治价值，以“太平”为理想之治的政治哲学，相较于儒家以“大同”为理想的“中国梦”，《太平经》则提供了另一种以“太平”为理想的“中国梦”。

最后说一说本卷的写作分工。本卷的写作是由多位学者合作完成的。每位

撰稿人承担的论题都是自己擅长的领域，并进行过深入的前期研究。撰稿人以此为基础，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严谨地分析和论证，用心地向读者表达他们的真知灼见。本卷的具体分工如下：彭永捷撰写了“前言”并负责组织和初审稿件；秋风（姚中秋）教授承担了关于董仲舒的部分，曹婉丰博士承担了有关王莽受禅和改制的部分，秦际明博士承担了关于《白虎通义》的部分，秦晓慧博士承担了有关《太平经》的部分，刘璞宁博士承担了关于王通的部分，杨汝清博士承担了关于韩愈的部分，梁涛教授承担了关于王安石的部分，段海宝博士承担了关于司马光的部分，岳晗博士承担了关于朱熹的部分，任锋教授承担了有关陈亮和叶适的部分，王心竹教授承担了有关黄宗羲的部分。作为本卷的主编，对参加本卷写作的各位学者的辛勤写作和通力合作表示感谢！

彭永捷

第一章 董仲舒论天人之际的治道

董仲舒是汉代博学的儒家学者。他以目不窥园的刻苦与勤奋，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天地万物无所不究。董仲舒将儒家的仁义思想与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和讖纬学说相结合，努力使汉王朝重拾儒家由上古政治传统所总结出来的政治经验和政治原则，从而使政治重新回归正确轨道，也就是儒家经常说的“不可须臾离”（《中庸》）的“常道”。董仲舒立足于经，综合孔子以来的各家学说，发展出复杂且较为完备的义理体系，并以此推动社会治理模式之根本变化，奠定此后两千年之政制大局。从儒家义理和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董仲舒实为孔子之后最重要的人物。

今日探讨董仲舒思想，主要依据的是残本《春秋繁露》与《汉书·董仲舒传》所收对武帝三策。纵观《春秋繁露》全书，可见董仲舒的思想明显分为两部分，或者说董仲舒的思想有前后两期之表现：上部为《春秋》学，推明《春秋》大义，主改制；从《阳尊阴卑》始为下部，推阴阳之变，主更化。^①对武帝三策，则将二者糅合为一体，而以推阴阳为本，此可视为董仲舒思想体系之成熟者。

^① 徐复观先生述董仲舒思想，即分为两部分，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第一节 董仲舒之问题意识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问题意识是围绕什么展开的？《史记·儒林列传》曰：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董仲舒殚精覃思者，何也？去秦制。此实为秦汉以来儒者之共同志向。

一、儒生与秦制

秦之立国精神，在由余贡献于秦穆公之“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史记·秦本纪》），打破封建的多中心结构，转聚万民为一体。自商君以来之法家，为达成此一政治目标提供了制度和技术，最终到秦始皇，建立了一套空前的绝对皇权政制：皇帝享有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分布在郡县、乡里控制体系内的官吏，以刑律为手段，直接控制民众。

商鞅时虽禁止私学，但秦灭六国后，不能不重视东方之学术，故儒生也曾以博士身份进入政治过程，参与决策。比如，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曾与博士共同商议，提出以“泰皇”为号的建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欲封禅泰山，曾征求众儒生意见。

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

儒生与秦始皇发生冲突：儒生建议秦始皇采用封禅之古礼，旨在恢复古典祭祀之礼，使秦始皇敬天，土石草木皆为天所生，不敢伤土石草木便是敬天之意。

这一建议被秦始皇断然拒绝。至少自尧舜时代，历代王者均敬天，以为最为崇高的祭祀对象。然而，秦始皇不敬天，《史记·秦始皇本纪》所收秦始皇巡守各地所勒之铭，文中罕有“天”字，这与周代文献形成鲜明对比。而儒生敬天，故两者发生冲突。秦始皇最终采用“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也即坚持

采用秦人之礼。

此后，儒生与秦制发生重大冲突，秦始皇三十四年（213年）：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史记·秦始皇本纪》）

周青臣认为，秦始皇之最伟大功业在于废封建，立郡县。而博士齐人淳于越认为，这恰恰不是“长久”之计。欲长久，不能不“师古”，也即复封建，回到三代。儒生在秦始皇时代就已提出此后一百年儒家思想展开之两大主题：复古更化，以求长久。

看得出来，秦始皇最初尚在这两种意见之间摇摆，李斯则断然反对复封建。针对儒生怀疑宪制之议论，李斯进而提出焚书之议。后又有坑儒之事。

至此，秦与儒生彻底决裂。孔子于礼崩乐坏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删述六经，传之弟子。此为高度成熟的知识体系及立足于三代治道之儒家治理之道。任何治国者，为求秩序稳定，不能不用儒生之知识。秦扫灭六国之初，儒生也确实得以进入宪制结构中。但秦制与儒家治理之道相悖，身在秦制中的儒生，自然希望改造秦制，他们抓住各种机会，展开这一事业，却最终没能成功。《史记·儒林列传》谓：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此一事件可见儒生与秦制之间，势如水火。

二、汉承秦制

不幸的是，“汉承秦制”，刘邦兴汉，重建秦制。儒生乃延续秦朝儒生之志业，继续推动复古更化。汉儒首揭此义者为陆贾。《史记·酈生陆贾列传》记载：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